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9

東亞傳世漢籍文獻 譯解方法初探

鄭吉雄、張寶三◎合編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東亞傳世漢籍文獻

譯解方法初探

ISBN 986-00-1438-8



9 789860 014389

00400



定價：400元

價格學刊：T2358

¥192.00

廈門市價格監督檢查分局監制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9

東亞傳世漢籍文獻 譯解方法初探

鄭吉雄、張寶三◎合編

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 / 鄭吉雄、張寶三合編。
--初版二刷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民97〕
368面；15*21公分。（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9）
含名詞索引及人名索引
ISBN: 978-986-00-1438-9（平裝）

1. 漢學 - 東亞 - 論文, 講詞等
2. 文獻學 - 論文, 講詞等

003.07

94010875

統一編號 1009401382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9

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

編者：鄭吉雄、張寶三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李嗣涔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法律顧問：賴文智律師

展售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 ntuprs@ntu.edu.tw

責任編輯：林沛熙

封面設計：昇薰閣 (sublimation.studio@gmail.com)

出版時間：2008年1月初版二刷

定價：新臺幣400元整

GPN: 1009401382

ISBN: 978-986-00-1438-9（平裝）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

導 言

鄭吉雄^{*}

一

自 2003 年 7 月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東亞文獻研究室作為中心四個研究室之一，開始推動一連串學術活動，將東亞文獻的研究，朝向整合性、理論性、脈絡性等三個方向推進，並強調縱深化的議題與國際性的合作，遂有 2003 年 12 月 11、12 日的「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這部論集，是在該次會議的論文中，擇優輯錄，既作為本中心現階段強調整合交流的研究成果，也希望對於當代東亞文獻研究，能夠產生若干的推動與轉化的作用。

衡諸世界各文明系統演進的通則，文獻的累積，係文明發展的重要指標；探討文獻研究方法之相關問題，也是知識分子反省文明進程的重要工作。中國奕世相傳、並流播至韓國、日本、越南等地，而發生影響的重要經典文獻，數量極多。而其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東亞文獻研究室召集人。

流播過程，中、日、韓、越各地學者均依其歷史文化背景的特性，按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翻譯、詮解，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方法與傳統。事實上，傳世漢籍文獻在世界各國翻譯與注釋的歷程，也反映了東亞文明在東西方流傳播遷的歷史。這部書所收的各篇論文，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切入觀察漢籍譯解方法的相關問題。以下我將一一簡略說明各篇撰著重點，最後綜合討論，剖析義蘊，說明本書編輯旨趣所在。

二

康達維教授（Professor David R. Knechtges）的論文是研討會主題演講的講稿，也是本書唯一收錄的英文的論文。作者首先特別提揭“perils”和“pleasures”兩字，說明翻譯工作看似輕鬆，但其實極為嚴肅；雖則危險，又同時充滿樂趣的交錯情形。作者首先強調，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轉換而已，而是譯者引導讀者放棄自身原有的語言習慣，進入原典原文作者的文化和語言世界。因此，翻譯絕不是技術性的工作，而是與原典的學術地位相同的高層次學術工作。

作者接著透過分析歐洲漢學家翻譯中國經典的歷史，說明轉譯經典背後的種種繁複的問題。作者指出，歐美翻譯者往往是根據他們所理解的東方文化與宗教作為評判準則，來決定選擇哪些中國經典進行翻譯，並因此而創造了新的「經典」，但這卻不一定能反映該經典所源出的傳統和文化價值。例如早期

耶穌會士受其宗教關懷的影響，因此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四書》。他們認為《四書》是中國宗教傳統的核心經典。而《易經》的翻譯者也有近似的情況。例如 Fr. Joachim Bouvet（白晉，1656-1730）認為《易經》是將世界一切現象化約為量化的度量衡單位的一把鑰匙。而一旦西方漢學家進行翻譯，即面對了經典不穩定性：一方面是原典原義本來就很難完整重現，而在經典流傳的千百年歷程中，不同的版本彼此同異互見，不同的學者又作出各不相同的注解，更大大提高了這種不穩定性。在中國眾多的經典中，以《易經》為尤甚。因為《易經》成為一個確定的文本，是遲至三世紀的事；而《易經》中的許多文字的歧異性和內容的多重性所產生的問題，甚至近年有了新的出土文獻作為參照，亦無法完全解決。作者認為，應付的辦法之一，是選一個特定的注疏來翻譯《周易》，像是 Philastre 的法文本就是根據程頤（正叔、伊川，1033-1107）和朱熹（元晦、晦庵，1130-1200）的意見，或是 Richard Lynn 遵循王弼（輔嗣，226-249）《注》的翻譯。但總而言之，翻譯者必須在這方面保持高度的警覺。

面對同一部《易經》解釋傳統，西方不同語系的譯者雖然存在重大的分歧，但他們的基本目標，始終是希望找到一個「原來的《易經》」。當然他們都承繼了高亨（1900-1986）、李鏡池（1902-1975）等古史辨學者的研究成果。像 Edward L. Shaughnessy、Richard Alan Kunst 和 Richard Rutt 都能區別經傳，直接研究西周初年的卦爻辭的意義。三位學者之中，只有

Richard Rutt 出版了他的翻譯。不過這些想重現原典的學者有時也有其限制，不能透過比較原典的內容來獲得原義。作者指出，過去多位漢學家釋「遯」卦為「豚」，卻沒有引用到一項證據，即「中孚」卦「豚魚」二字，在漢晉時期就有學者寫作「遯魚」。像這樣的例證是不應被忽略的。作者認為，翻譯工作必須至少提升到這樣的層次。最後，作者指出，翻譯其實等於另一種注解，一方面譯者應該覺察到所選的版本的限制，另一方面譯文本本身也需要另加注解。事實上，作者自己從事《文選》翻譯時就加入了數量龐大的注釋。他認為翻譯工作的真正樂趣，就在於檢驗證據，發掘每一個細節可能有的意義，然後在注解中以清晰的辯證支持其論斷。如此翻譯雖然很慢，但良善的翻譯正是一門緩緩逐譯、慢慢咀嚼每字每句的藝術。

康教授深度與張力並具的論文，為這次研討會揭開了重要的序幕，也在技術層次與理論層次兩方面給予與會者重要的啓示。如果我們將東亞視為一個整體的區域，那麼本書所收的各篇論文，事實上涉及此一區域文獻譯解三個方面的問題——文獻注解的型態與性質問題，文獻詮解的思維與方法問題，文獻譯注的語言制約問題。以下分別說明。

三

關於「文獻注解的型態與性質問題」，是指中國傳統學者注解文獻，在方法上具有何種特殊性的問題。這方面，本書收

錄了張以仁師〈從溫詞〈歸國遙〉「小鳳戰篴金飀艷」句五家注的討論談到注解的態度與方法問題〉、張素卿〈「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和莊雅州〈論考釋《爾雅》草木蟲魚鳥獸之方法〉三篇論文。張師的論文針對溫庭筠（飛卿，約 812-約 870）〈歸國遙〉詞「小鳳戰篴金飀艷」句，仔細商榷華連圃等五家注解，審音辨義，詳作分析與討論，確定正解。並且以此為基礎，透過檢討五家注語文方面的錯失，以呈顯訓詁的步驟與方法之重要，從而提出慎讀原典、詳酌舊說、覆按資料、印證同例、提供理據等步驟，及稽之舊訓有據、揆之本文而協、驗之全詞亦通、求之他例可證、按之音律能諧等檢驗方法，以期建立學術性的注解方式。本文並非 2003 年 12 月譯解方法研討會的論文，且經已在《史語所集刊》發表，¹因為這篇文章直接觸及注解方法與態度問題，在方向與範疇兩方面完全與本書各篇主題吻合，因此特別向作者情商，收錄在本書之中。

張素卿的論文認為，「評點」可說是與經典「注疏」傳統相應的一種小傳統。評點起源於閱讀，與儒者之讀經、解經有密切的淵源。從南宋到清代，評點《四書》和群經的著作愈來愈多。作者也比較了注疏和評點的同與異：注疏始於離析經文、斷句分章；評點則畫分段落，分析文本的離合。兩者都不免以區斷文本入手，以闡發經典之義為旨歸。然而注疏憑藉訓詁方法以通古今言語，評點則主要關注本文脈絡，運用圈點抹

1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3 分，民國 93 年 9 月，頁 423-443。

畫等標示符號進行分析、賞鑒，並與夾注、尾評等語言文字之評論，相互映發。不過作者也指出，雖然評點可以被視為經典延續和流行的一個歷程，但亦未為理想。

莊雅州的論文討論了考釋《爾雅》末七篇²的方法和態度，提出「因聲求義」、「比較互證」等共九種考釋方法。作者特別提出《爾雅》內容的複雜性、文字的簡略性和注解的分歧性，強調兼採各法，不宜偏廢。各種考釋方法的效用亦各有所偏，研究者也必須充分運用新知，謹慎從事。尤其重要的是對於無法考證以及難以定論的地方，必須存疑付闕。綜而言之，「評點」作為一種新型態的「準注釋」文獻，既有別於正統的注疏，但又能補充注疏的不足。至於《爾雅》一書，本身就是極具特殊性的解經的文獻，卻因為內容簡約艱深，常常被研究經典詮釋的學者所忽略，十分可惜；而莊教授的研究，也就顯得更彌足珍貴了。

四

關於「文獻詮解的思維與方法問題」，是指詮解經典的文獻所關涉的思維與觀念、以及思想史的相關問題。這方面本書收錄了李焯然〈越南狂士黎文敵《大學晰義》對《大學》的詮釋〉、林忠軍〈試論漢儒以象解《易》方法〉和何俊〈晚宋儒

2 即〈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和〈釋畜〉。

學的轉型與解經方法的變化〉共三篇論文。李焯然的論文簡述越南儒學的歷史概況。如我們所知，越南一向被視為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從陳朝（1225-1400）便已以中國的制度為依據，在數百年間深受中國官方提倡的程朱學說影響，對儒學的探究，與日本、朝鮮比較起來，創獲較少，學者的著作亦不多。作者特別討論了阮朝（1802-1945）時代、自號「狂士」的儒生黎文敵（應和，約 1859-1935）的注經思想。黎氏對《大學》的理解和詮釋，以「知本」為核心，以「倫常之道」和「陰陽之道」來解釋《大學》，一方面深受《易》學、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同時又融入了西方自由主義和科學思想。這反映了越南學者在西學衝擊的過程中對傳統經典的新詮釋。越南儒學一般較為東亞學者所忽略。本文無疑讓讀者得以透過一個實際的案例，一窺越南儒學特質的一隅。

林忠軍的論文在方法和方法論兩個層次上，討論了以象解《易》的問題。作者認為八卦和六十四卦本身即係一種形象符號，突破了文字語言的侷限。以象解《易》的方法始於春秋時期，而大量被《易傳》尤其是《說卦傳》運用。其後漢儒用「以象生象」和「象外生象」的方法，使以象解《易》之法，更為縝密。漢儒同時參用了以數解《易》和以象解《易》相輔而行，透過訓詁和各種嚴密的驗證之法，對於象數《易》學的傳統作出了新的貢獻。本文也同時提示了象數詮《易》的限制，並分析了以象解《易》之法式微的原因，充分顯示作者具有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事實上，義理詮《易》和象數詮《易》各有其

方法論背景，兩種詮釋理論都各有其預設和限制，很難哪一種絕對有效。尤其注釋像《易經》這樣具有高度抽象理論思維的文獻，任何研究者在提出詮釋理論時，都必須保持警覺，謹慎從事。

何俊的論文藉由解釋「思想」與「學術」之間的關係，說明晚宋儒學本身已發展出清代考證學的必然性。作者提出了一個學術（文獻考據）與思想（哲理闡發）發展的解釋模式，認為學術支撐了思想，而思想則引導了學術。當思想向學術轉型時，思想本身會因為學術的展開而發生變化；而作為思想支撐的學術一旦被修改，思想也等於被解構。作者認為南宋以朱子學為主流，朱學在浙江的傳播主要是由「義理闡釋」過渡為「經史考辯」。尤其王應麟（伯厚、深寧，1223-1296）與黃震（東發，1213-1281）的論著已具備思想轉型為學術範式的性質，與清初治考證大師的論著極為相似，既影響到朱學思想的發展與轉型，也促進了清初學術的形成。考證方法的凸顯，說明了宋學在朱熹思想成為正統以後，便有著轉型的內在需要，亦即說儒者在理解與闡釋思想時，由思想的關注轉向對思想的「表述方式」的關注，由是考證學也成為擺脫空疏無本的思想論說的重要而有效途徑。何俊的論文分析相當細膩。當然，關於清代思潮的典範性是否從南宋理學內部發展出來，是一個仍具爭議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何俊提出的解釋模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五

關於「文獻譯注的語言制約問題」，涉及的是東亞地區不同國家之學者在翻譯、解釋中國傳世文獻時，受到語言的制約，而產生出特殊的方法，進行詮解。本書的兩篇論文：金文京〈試論日韓兩國翻譯中國典籍的方法〉和木田章義〈日本における漢文訓讀の歴史〉（日本漢文訓讀史）討論了「訓讀法」，直接涉及漢籍文獻在跨文化傳播時源出於語言歧異而產生的譯解問題，此一問題，康達維教授在其論文中已就中西轉譯的各種複雜性作出分析。這兩篇論文則討論了中、日、韓語言轉譯的複雜性，與康教授的各個論點遙相呼應。這在我們所關懷的主題之中，顯得別具深意。

金文京的論文介紹日韓兩國爲了閱讀漢籍所發展出的「訓讀」，亦即以本國語言來詮釋中國文言文的方法；而木田章義的論文則主要論述日本漢語訓讀的歷史發展，並點出這種方法是日本吸收外來文化而消化爲自身文化的一個典型。首先，作者認爲訓讀的方式，是先經過解讀，把中國典籍完全解構，再用自己的文化語言框架來重新架構。韓國位處中日之間，較日本早一步接受中國典籍，也較早發展出訓讀法。漢語與日、韓語的語言系統不同，文法語序迥異，訓讀法便因此而生。日人所謂的訓讀，包括字音和語序兩方面，語音方面，或用日語固有語言讀漢字。標音的方法，則仍用漢字標音。若直接讀爲中國音的讀法，則稱爲「音讀」。至於語序的訓讀，中文與日文的語序不同，最明顯的是動詞和賓語的次序。作者也追溯訓讀

的源流，認為是起源於華嚴宗、三論宗、法相宗等的早期佛教宗派僧院。由於各宗派對佛經的不同詮釋以及宗派傳承時保密的需要，乃產生各種不同的方式。韓國接受中國文化比日本早，語言基本上跟日語屬同系統。古代韓國亦使用類似日本的訓讀法，顯示日文的訓讀法可能就是由韓國傳過去的。若從廣義的訓讀來觀察，從中國周圍民族中看到的訓讀現象相當廣泛。總的來說，作者認為日韓兩國為閱讀中國典籍造出多種記號和繁複嚴密的訓讀架構，這種現象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木田章義的論文指出，根據日本八世紀的文獻記載，當時就已確立了將漢字、漢文轉換為日語書寫的方法。大致而言，利用漢字和利用音假名各有優劣。學者於是從佛教界領悟了新方法，即把漢文用日語的閱讀順序抄寫下來，也就是「返讀」的方法。如此，則漢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變換成日文，並能為日本人所理解。這種被改裝成日語的漢文通常被稱作「訓讀文」。具而言之，漢文訓讀就是用古文文體讀漢文。這雖與當時的日本口語文體迥異，但訓讀文仍能被現代的日本人所理解，令人驚異。另方面，日本人想出返讀（顛倒句中的主述詞順序）漢文的方法，使漢文可做日文讀，而且讓讀法精緻化，最後所確立的訓讀文形式，也能運用於日語表現之中，日語可自在表現的散文文體於焉誕生。這也可見訓讀文積極影響的一面。作者根據訓讀文形成的歷程，進一步論證日本接收外來文化的模式，認為日本文化一方面輸入中國文化，受其影響，一

方面仍以固有文化為基礎，將外來和自身的文化交互融攝。「訓讀」可說是體現了日本式的文化接受型態。

事實證明，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語言和文獻型態的各種繁複的問題，就貿然奢談東亞經典詮釋理論，往往會陷入危險而不自知。上述兩篇論文，具體地說明了「語文分析」與「經典詮釋」之間的重大關係。其中所舉的各個例子，以及針對「訓讀」在東亞經典詮釋史上深遠影響所作的分析，都值得我們深思。而個人自去年起在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推動「語言文獻分析與東亞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中心核心計畫）的動機，亦是希望在這個課題上，作出更深入的探討。

六

以上討論的三個問題，各篇作者都從專業的角度，作出非常深入的剖析。然而，關於東亞傳世漢籍文獻的譯解問題，個人認為還有幾個方面，值得進一步探究。以下分別提出一些思考。

首先，從文獻注解的型態與性質問題進一步思考，還有兩個問題是必須注意的。第一個是注解內容的整體性問題。東亞儒學傳統中，最重要的學者大多窮畢生之力，將自身的思想寄託在對一兩部經典的註解之中。然而，註解內容必然是隨文（經典本文）見義，亦即說注文是散落在原典各個語句、段落、章

節之下，而無法成爲一篇首尾完足的論述。然而注經者思想的系統性與連貫性，卻不應因此而被視爲一堆散亂而彼此無關的片斷。因此，作爲後世的研究者，我們有責任探討受到著作結構限制的注解文獻，找尋其中內容的通貫性，以便重新建構作者的思想。另一個問題則是經典注釋的範式問題。當古人詮釋一部經典時，可以採用的注經模式雖然很多，但就其方法取向而言，其實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對某一部經典的某一種注解的體系（整體內容）與思想（意識型態），特別加以發明、承繼。這一類模式，我姑且稱之爲「溯源」的方法，這種模式的方法論背景，主要是認爲一種舊的注解，本身具有獨立的思想架構，有一套完整的詮釋體系，後繼者有責任去全部承繼或發明舊注自成體系的內容。西漢經師受到師法、家法的制約，章句訓詁率由舊說，就是這一類注經模式的體現。另一種是將許多種舊注打散，不去理會各種經注的思想體系異同問題，只依照自己的思想體系和價值判斷，作出選擇。這一類模式，我稱之爲「集解」的方法。其方法論的背景，則是認爲不必理會每一種舊注解體系的整體性，而只是從眾多的經注中，選取撰著者認爲合理的部分，對經典原文加以解釋即可。這兩種注經模式，各有優缺點。前者的優點是保留了某一系統的注經思想的純粹性，缺點是墨守師說，不問是非；後者的優點是去短集長，缺點則是導致不同系統的經說與思想全部混淆。這種優劣互見的情況，究竟如何影響傳統經典詮釋工作的發展，我們未來又應如何選取適當的注經方式？這還有待我們進一步深思。

其次，從文獻詮解的思維與方法問題進一步思考，個人認為文獻結構與思想觀念之間的關係，尚可作更深入的探討。以漢學家與理學家注經的不同方式而論，一般的理解，漢學家比較傾向「我注《六經》」，而理學家則比較傾向「《六經》注我」。前者突顯了對經典傳統的客觀繼承，後者則突顯了詮解者主觀意志的發揚。從一方面說，這顯示了東亞經典詮釋的兩條途徑，兩者在經典傳統中都各有特性和貢獻，也自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說，兩者並不是無法融通地處於相反方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戴震（東原、慎修，1723-1777）在《孟子字義疏證》中博引各種儒家經典文獻，忠實地闡釋《孟子》書中的觀念字，可謂典型的「我注《六經》」；但在客觀分析的內容之後，戴震也對每個觀念字加以義理的發揮，並作思想上的批判，內容充滿個人玄思的理趣，又可謂「《六經》注我」。戴氏的個案足以提醒我們，用簡單的二分法去區分不同時期的文獻詮釋者，有時也難免有若干限制。

再者，從文獻譯注的語言制約問題進一步思考，就東亞儒學而言，以漢字書寫的儒家經典傳至日本和韓國，日本儒者和韓國儒者亦多以漢字詮解經典。訓讀之法，證明了日、韓儒者設法盡量體貼經典中的漢語結構，同時又盡量融通兩種語言的努力。這顯示了東亞語言歧異的約束，反而引導出積極的影響力。然而，從另一個語言以外的角度看，像韓國儒者受到北宋以降中國儒者擅用「圖象詮釋」的方法詮釋《周易》的影響，將這種方法加以轉移，用來詮解諸如理、氣、誠、命、四端、